

宋初收权得失略论

程兆奇

提要：宋太祖是凭藉着手中的兵权从孤儿寡母那里抢下江山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周太祖郭威拥兵夺权也都是昨日之事，因此，铲除掌军武人坐大的温床，保全赵氏的皇脉，避免唐季以来数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的历史重演，在宋太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宋建立后在救平割据方国的同时，对加强皇权进行了有相当自主意识的制度更张，加上贬抑武人、优容文士而孕育出的强烈的“正统”意识，有效地改变了唐末以来篡僭相继的历史方向。然而，宋代在权力上的“大一统”既足保赵氏皇脉免遭内部的侵害，便不能不付出过分集权所难以避免的军队战斗力弱化等等的代价，这在边患压力特重的宋代，尤其显出了它的危害。

关键词：宋初 收权 得失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¹是宋太祖被江南（南唐）使节许铉“逼”出来的一句心里话。宋建立后，南唐以卑姿事宋，宋凡有出师克捷、吉庆喜事，南唐都会遣使犒师修贡，逢到宋的盛大庆典，南唐更以“贡宴”为名，别献珍玩。宋灭南汉后，南唐兔死狐悲，上表乞去国号，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国内建制也全面降格，如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但即使江南对宋曲尽逢迎，宋还是并不改变消灭江南的方针。许铉使宋，就是为此向宋太祖申不平的。许铉说：“李煜（江南主）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²宋太祖于是说了上面那句霸气十足的话。

不仅是对外的征讨，宋初释宿卫兵权，收强藩行政权，削宰相兵、财权，为后世垂“家法”，其脉络的源头也就是这句话。宋太祖出此

¹ 岳珂《程史》卷一《徐铉入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²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十一月（为十月之误）己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长编》记此事时未录上述太祖语（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辛未附注[第100页]中有此语，但未注明出自太祖之口），《程史》只说徐铉“其言累数千言”而未及具体，两者本为一事。

豪语，自可见其帝王气概，但也并非全由其素性使然。后周世宗号称“一代英主”，但和古今那些雄豪比，还算不上什么，而当时未立宋统的赵匡胤（宋太祖）却只能雌伏于之下，供其驱遣。宋太祖之所以在根本处决不让步，实在是严酷环境给了他太多的教训。

禅让剧掩盖的匡胤素志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 960 年），后周大将匡胤趁“主少国疑”之机，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

正史稗说多说这场兵变由匡胤部下一手策动，与匡胤无关。比如说事发时匡胤尚在梦乡，比如说匡胤以约法三章作为接受拥立的条件，比如说匡胤事成回京后对周相范质、王溥“呜咽流涕”说的那番自责的话……。但编出来的故事终未免百密一疏。

李焘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宋代周出自天意，其中有这样一句：

能律将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禅之不归，能择长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遏陈桥之逼。天实为之，吾其奈何？³

但是，我们不正是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能律将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禅之不归，能择长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遏陈桥之逼”？

其实，只要排除掉“正统”的迷障，就很容易看出这场兵变的疑问：为什么北汉结辽南侵没有下文？为什么甫事发兵，都下即有“点检为天子”⁴的谣传？为什么面对诸将谋立扰攘，赵匡胤、赵普未曾入白即部署诘朝行事？为什么军将（有的说是高怀德）、陶谷会私备足致杀身之祸的黄袍禅位诏？为什么既以赠官礼葬嘉韩通之节，复又不能容开宝寺中韩通之画像？这些不都足见这一黄袍加身剧的幕后谋主必是匡胤么？兵变后匡胤还京师，人报匡胤母杜氏，她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⁵一语泄天机，原来这正是匡胤的久蓄之志！

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乙巳，第 2 页。

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壬寅，第 1 页。

⁵ 《宋史》卷二四二《太祖母昭宪杜太后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8606 页。《涑水纪闻》卷一谓：“即将北征，京师间諠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姐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司马光，中华书局 1989

避免篡僭重演的削兵权

宋太祖是凭藉着手中的兵权从孤儿寡母那里抢下江山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周太祖郭威拥兵夺权也都是昨日之事，因此，铲除掌军武人坐大的温床，保全赵氏的皇脉，避免唐季以来数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的历史重演，在宋太祖心目中必占特殊的位置。所以，当宋初割据山头林立、正需牢笼武人效力之时，太祖才会做出释兵权这样有拂武人意愿的决策。

匡胤掌握后周最高军权是因为得任“殿前都点检”。殿前都点检初设时地位并不在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上，但因殿前诸班的军力更强，所以殿前都点检很快就成了最有实权的军职⁶。相传周世宗柴荣生前最后一次出征时曾得一木，“上卦全题云‘点检做’”⁷，引起对时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与柴荣有郎舅谊）的疑忌，归后即罢张永德而改以匡胤继任。因为史载其时永德与李重进有间，所以有人以为此事是重进系势力对永德的构陷。其实，在当时那种乱局下，有心问鼎的人使出栽赃把戏都不奇怪。不出大半年“点检为天子”的谣言复起并弄假成真即可为证。不过，在此提及此事并不是为了侦缉此案，而是想通过这个以“点检”为内容的事端既可借刀杀人，也可为篡位造势，说明“殿前都点检”这个位置在当时权力系统中所具的举足轻重的分量。太祖收取兵权正是从殿前都点检开始的。

宋建立时，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方握重兵屯真定，太祖即遣使许以便宜行事，不久又加殿前都点检。这是换取实力派认可的一种伎俩。据说太祖与延钊还是友善的，后周末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即以兄事为副都点检的延钊，入宋后太祖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⁸。虽如此，友道和信义仍不足以防范权力的威胁，所以，一旦大局安定，太

年版，第4页）可见赵氏家人已预闻此阴谋。

⁶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谓：“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页）

⁷ 《旧五代史》卷一一九《世宗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83页。

⁸ 《宋史》卷二五一《慕容延钊传》，第8835页。

祖还是罢了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事在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从此殿前都点检便不再除授。同时罢职的还有在五代时名位不下于匡胤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马步军都指挥使也是军权很重的一个职位。

同年七月，太祖开始收取亲信的兵权。当时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各点禁卫，因为他们不仅是太祖的故人⁹，而且在拥立匡胤上功劳很大，所以赵普数言收权，太祖都不以为然：“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据说太祖最后被说服是因为普说的一句颇含忌讳的话：“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¹⁰陈桥的旧事对说服太祖当然是最有力的。接下来的曲宴情况各书所载略有异同，大致是太祖道为君的难处和人生当及时行乐（广置田宅多积金银伴以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之类），守信、审琦等涕泣拜谢，次日即请解兵权等等。太祖一面慰抚赐赆，一面迅即批准“请求”：以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侯、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从此亦不再除授。守信破例仍兼马步军都指挥使，“其实兵权不在也。”¹¹此职实际也被废除。

在罢去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后，太祖又于开宝二年（969 年）宴请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藩臣，说：“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让他们罢镇改官。如果说建隆初诸大将已难违旨，至此俯首听命“竟自陈攻战阔阔及履历艰苦”¹²也就事有必至了。

此事后被称为“杯酒释兵权”。其中解守信等人兵权事，有人指出早期记载多有抵牾，不足采信。但这些记载异中也有同，比如都谓事出赵普建言，都谓由太祖与普两人密商，而且，即便并无曲宴，解兵

⁹ 李攸《宋朝事实》卷九《勋臣》谓：匡胤与石守信、王审琦以及杨光义、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赞、王政忠十人曾结为“义社兄弟”。（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7-158 页）

¹⁰ 《丁晋公谈录》，《百川学海》，中国书店 1990 年版，第 973 页。

¹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第 19 页。

¹²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十月己亥，第 90 页。

权则为确事。不仅是解某些人兵权，贬抑武人本是宋初的基本方针。

宋初殿前、侍卫两司仍沿五代，但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五大要职或不再除人，或偶尔虚授，殿前司、侍卫司实由品秩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掌。而且，因为枢密院掌兵籍虎符，帅臣主兵柄，三衙只有管理权；又创所谓“更戍法”，使禁军三年一轮戍，名为“习勤苦，均劳佚”，实际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其结果便是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¹³，这就有效杜绝了高级将领拥兵自立的可能。就如宋人所说：“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¹⁴

剪除强藩以使“天下之势一”

在消除军将兵权的同时，宋廷还采取了收取节镇权力的措施。据说这也是出于赵普的建言：

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¹⁵

这是切中时弊的重要主张。五代以来，藩镇强盛，朝廷不能约制，宋初异姓王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情况并未根本改变。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建隆元年（960年）起即开始徙节镇驻地，以消除久居盘结所积聚的力量。如八月徙保义节度使袁彦为彰信节度使，忠武节度使张永德为武胜节度使，九月徙建雄节度使杨庭璋为静难节度使（太祖初疑杨庭璋有异志，后释然，仍不免徙命）。又逼反昭义节度使李筠（四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九月）；二李败后均举家自焚死（重进之兄、弟亦均自杀或被杀）。七月，后周赵国公李穀因李筠反“忧恚”而死。同月，河阳节度使赵晁归京后卒。这些节

¹³ 《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27页。

¹⁴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富弼《乞选任转运守令以除盗贼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6页。

¹⁵ 《涑水纪闻》卷一，第11页。

度使或徙或反或亡都有具体原因，但从总体上看则是宋初削藩政策所由致。以后节度使渐改为遥领，不驻节镇。

乾德元年（963年）初，始在新占领区以文官知州事，称“知州军事”，州指民政，军指兵事，简称“知州”。同年四月，又设通判于新占领诸州，对“伪命官见为知州者”，“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¹⁶。因通判有监督知州行事之责，故通判又有“监州”之称。以后推向全国，知州、通判成为州的正、副长官。不仅知州、通判，知县等地方官也都由中央任命，对中央控制地方具有关键意义。后又命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节度使权力因此更轻。

乾德三年（965年）三月，置诸路转运使，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自唐代天宝以后，藩镇租税所入，多以自贍，名为“留使”“留州”，交往朝廷者甚少。五代藩镇更强，输贡因此更少。设转运使后，财权由转运使专掌，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不再有权签书金谷之籍。诸州除度支经费，金帛悉送京师。这样地方财权便转到了中央。

同年八月，选诸道兵入补禁军。办法一是命诸州长吏选择本道兵“骁勇”者，一是以“强壮”兵卒为“兵样”，送往各地作为选兵标准。选剩之老弱者，则编为厢军。这样，一面加强中央，一面削弱地方，使强弱之势悬殊，地方无法再对中央构成军事威胁。又创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名为“以习勤苦，均劳逸”，因将不随军而迁，故实亦存使“将不得专其兵”之意。为防止兵变又增加了一道保险。（以后“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问题日益严重，终至造成极大恶果。不过这是后话。）

太祖时又鉴于五代诸侯专刑辟之权而至有枉法杀人者，规定诸州决大辟，须录案闻奏，付刑部详覆。

对宋初的这些措置，南宋的吕中曾这样评价：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

¹⁶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19页。

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置县尉，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¹⁷

朝廷之命令贯彻于地方固难有使臂使指的效率，但怠慢则有之，“异图”则从制度上根本杜绝了。

变“事无不统”为二府三相

相权过大，也会威胁皇权。所以缩小相权，也是太祖所措意的一个方面。

宋代相权之不尊，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即：废除坐论之礼，宰相只能站立奏事。古者三公坐而论道，至唐五代皇帝与宰相论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史称“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¹⁸。“齷齪”未必，“循默”则事有其不得已。太祖激赏范质为“真宰相”，太宗称质“循规矩，重名节，持廉洁，无出质之右者”，评价也很高，但太宗在这句话后又说了很关键的一句：“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¹⁹宋初宰相范质等多为周旧臣，他们既不能如韩通以死守节，本已气短，又被罗彦环等一逼²⁰，早已如行尸走肉，再无生趣，不复存“相格”之奢想。所以有事多具札进呈，侍立听命。撤座立谈遂成制度。（就质等言，自可谓是宰相的罪人。）

撤座固有“偶然”因素在，但从宋初太祖的所为，亦可谓事有必至。宰相之权，本包括政军财等各种大事，号称“事无不统”。宋初将军财权析出，设枢密院以掌军政，与宰相府对称为二府，剥夺了宰

¹⁷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纪讲义》卷二《处藩镇、收兵权》，台湾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日期，误题吕祖谦著），第68页。

¹⁸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之语（第8940页）。同书卷二四九《范质传》谓范质“性卞急，好面折人。”（第8796页）但在太祖面前则“憚帝英睿”（第8795页），极其服帖。

¹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九月辛丑，第51页。

²⁰ 匡胤假惺惺谓“惭负天地”，范质误以为尚可挽回，列校罗彦环挺剑呵斥：“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遂屈膝。事见《涑水记闻》卷一，第3页。

相的军权；设三司掌财政，号为计省，三司使则号为计相，剥夺了宰相的财权。这样，从政、军、财系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皇帝负责而言，宰相已沦为“部门”首脑。

自殷商伊尹放太甲起，君相权力之消长，为王朝政治的极大事。抑制相权，是帝王驭下术中的最主要内容。帝王抑制相权的手段，一是以近代远，以卑代尊，及至近而远，卑成尊，复又开始新一轮的以近代远，以卑代尊。从丞相，三公，到台阁、三省，变来变去，其意无非如此。二是以多析一。如三省制下，中书省只掌决策拟诏，门下省只掌审议封驳，尚书省只掌奉旨行政。虽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但某一省长官的威与权，毕竟不如统领百官的宰相（比如秦汉丞相）。然而，就宰相一体而言，仍是事无不统。因此，宋代将军、财权析出，对削弱相权还是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时人有以为宋代相权实较前代更强，我以为尚可推敲。因为宋代虽有权倾一时的宰相，但权力无不出于皇帝的宠信，所以失宠必伴之以失权。所以，从制度上说，自宋代起相权已不再能构成对皇权的威胁。

析宰相之军、财权于枢密院、三司，无疑大有功于皇权的强化。此外，宋代对中央其他权力系统，比如监察制度，也作了有利于强化皇权的更张。宋代除以御史台继承历代纠察百官的监察机构外，另创与御史台职责完全相同的谏院。言官谏诤制度古已有之，如两汉之谏议大夫等，但职责本在规正皇帝。宋代将原隶门下省的言官分出，另立谏院，直属皇帝，变规正皇帝为纠察百官。这样的台谏合流，重复设置，为皇帝的控驭更增加了一层保险。

以文代武之初旨

宋初既取贬抑武人的政策，采用文士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太宗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²¹有宋一代，上自宰执，下至知州知县；包括枢密院的所有政军财法部门，以致于经略

²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十月癸亥，第201页。

安抚那样的武职，多由文士充任。蔡襄曾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²²

宋代还别有许多优渥文士的政策（拙文《宋代人文风气的历史成因》另详），终至“人文化成”，孕育出了帝制环境下人文风气最浓厚，文化成就最丰硕的时代。正如陈寅恪先生那句名言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²³

不过，要追根溯源，重文并不是太祖的成算，不是因为太祖在古今帝王中对“文化”独有偏好，而爱屋及乌泽被文士。惠及文士，只不过是太祖贬抑武人的副产品。宋代后嗣诸君多好文爱士，如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²⁴（太宗则为“天下无事，留意艺文”²⁵），如英宗以皇子入宫时“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²⁶，至有与艺文极褻者（如宋徽宗），实是重文风气已成后的别话。就太祖而言，任用文士仅仅是因为文士的无足于侵害赵宋的皇脉。

《涑水纪闻》中有一段为人引用很多的话：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²⁷

赵普贵为百官之首，又是建立赵宋王朝的一等功臣，只能得到所谓“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待遇，可见文士在太祖眼里是极不足道的。

²² 《蔡忠惠公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任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²³ 《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²⁴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²⁵ 《石林燕语》卷八，第117页。

²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八月辛丑，第1825页。同卷记赵曙（英宗名，当月癸未改）不受皇子命时委记室周孟阳代作辞表，每表饷十金，“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页同上）如此则“无异寒士，有书数厨”，不免情伪。但于此更可见以读书为尚的风气。

²⁷ 《涑水纪闻》卷三，第41页。

（王夫之以为此语出于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未尽愜²⁸。）太祖这样说恐非一时的兴之所至，当是胸中蕴蓄的不经意流露²⁹。他对普说的另一段话对此有极坦率地表白：“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³⁰文臣为害，非仅是“贪浊”，也未必不能如武人那样撼动根本，但发作毕竟较缓，不象武人的威胁骤然勃发莫之能御。而且，太祖生长在武人气势嚣张文士极其卑猥的五代，自己亦靠枪杆子夺得天下，在他心目中，文臣自然不足为虑。这种不足虑，不是说他对文臣的品格别有高估，以为文臣没有为恶之心，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文臣有为恶的能力——无非就是“贪浊”而已，还能使出什么大坏来！

对文臣如此，对士人初时亦不宽贷。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门人有被黜退者，兰入贡部理论，结果落得“决杖配商州”³¹的重罚。可见太祖的成算只有“抑武”而并无“右文”。

收权之弊病举例

宋代开国后所行之制度更张，实与加强皇权一脉相通。释禁军高级将领兵权，将军令、管理、作战分属于枢密院、三衙、帅臣，收节镇政军财权于中央，分宰相军、财权于枢密院、三司，贬抑武人、优容文士而孕育出的强烈的“正统”意识，不仅有效地改变了唐末以来篡攘相继的历史方向，也彻底消除了内部篡权的土壤。（张邦昌在北宋倾圮时受伪命为楚帝，不仅为士庶所不容，他也不敢存侥幸之想，所以金军一退，他即刻请出哲宗废后，奉还大宝。虽如此，仍不能为天下所容，终未免赐死。）

然而，一个方向上的过分不免另一方向的不足是事理之常，宋代

²⁸ 王夫之之语见《宋论》卷一之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5页。

²⁹ 《云麓漫钞》（卷二）、《湘山野录》（卷中）分别记录了太祖在内南门和朱雀门说的完全一样的话：“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页；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也许两事是一事，也许都是误传，然而不约而同虽不足说明事出其有，但却可说明事有其传。

³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第112-113页。

³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二月壬辰，第4页。

在权力上的“大一统”既足保赵氏皇脉免遭内部的侵害，便不能不付出过分集权所难以避免的臃肿迟钝（似相反实相成）难于周转的代价，这在边患压力特重的宋代，它的危害尤其显得突出。这一危害首先表现在对军队控驭的烦琐而造成的效率低下上。

如上所述，宋初为了避免重蹈五代武人夺位的覆辙，不仅撤消了殿前司、马步军司的五大要职，压低管军将领的级别，更重要的是采取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³²的措置。这一措置的制度意义，在于保障皇帝一人对军权的独揽。

“将不得专其兵”³³，消除了对皇帝的威胁，同时也失去了军队制胜所必须的将领之威权、将兵之间的相知和信任。早在太宗时，这一弊端已经显出。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曹斌大败于涿州，重要原因是“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逊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³⁴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颇为正人所讥的御使中丞贾昌朝上疏说：

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鸠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纵，将未得人，岂免屡易。以屡易之将，御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剩之弊也。且亲旧恩倖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置之死地，此用新旧恩倖之弊也。臣谓守镇之地无数更易，管军并刺使以上官秩宜审其所授，以待有功。³⁵

（此疏中“削方镇兵权过盛”，至金兴后尤其见其危害，正如以后范宗尹所说：“国家多难，四方帅守单寡，束手环视，此法[指太祖收藩镇]之弊。今当稍复藩镇之法，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付以兵权，俾蕃王室。”³⁶对于“靖康召兵，卒无应者”³⁷王夫之也痛有所感，他说：“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

³²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一，第3799页。

³³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35页。

³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乙未张洎奏议，第256页。

³⁵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六《上备边六事》起首为“三年”（第42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系于庆历二年十月戊辰（卷一三八，第1266-1268页）。

³⁶ 《宋史》卷三六二《范宗伊传》，第11325页。

³⁷ 《云麓漫抄》卷十，第173页。

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扼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³⁸关于此点，不再另详。）“以屡易之将，御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应是必致之事。同在仁宗时的蔡襄也尝上疏，说：“主帅等威既不尊异，向下官属更无节级相辖之理。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败也。”³⁹将不知兵，不仅使主帅之威不尊，而且不知兵，即不知己，而且“屡易”“骤择”更致不能知彼。所以，钱若水在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999 年）答诏论边事中以为“久不易则边事尽知”⁴⁰。不知己彼，为兵家之大忌，焉有不愆事之理？哲宗时殿中侍御使吕陶上疏，说：

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出师数万，而以生杀存亡之柄，授人于仓卒之中。把旄赐钺，建灵旗以启行，而三军之士不知其谁何，莫敢仰视其面，而欲与之同其生死，攻取战捷，不亦难乎？古之能辩疆场之事者，盖非责以岁月之劳，要之持久，而务有以克敌也。今乃不然，备边守塞要害重地，而以为武臣更践之涂，迟止再岁，速或累月，若寓居于传舍，而指期以去，敌情安能知？军政安能立？深谋远虑安能施乎？⁴¹

宋代排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将军队私人化的可能，但宋帝对军权的眷顾仍意犹未尽。帅臣出师，宋帝往往“从中降诏，授以方略”，甚至“赐与阵图”⁴²。又以所谓“将从中御”⁴³，在深宫中运筹遥控千里之外的战局。王安石曾说：

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

³⁸ 《宋论》卷十之二，第 218 页。

³⁹ 《蔡忠惠公集》卷二十三《请改军法疏》，第 403 页。

⁴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第 375 页。

⁴¹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一《论任将五弊疏》，第 2914 页。

⁴²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田锡《答诏论边事》，第 4173 页。

⁴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乙未张洎奏议中语，第 256 页。

此，即为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⁴⁴

太宗少精武艺，故对军事极为自负，谓：“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喻之，不听者多至败事。”⁴⁵

太宗行于前，宋诸帝效于后，战前庙算成了宋室的传家宝。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真宗亲征，“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⁴⁶仁宗对西夏用兵，“以阵图授诸将”⁴⁷。神宗“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⁴⁸钦宗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围城时“密遣”姚平仲袭取金营⁴⁹，不仅对节制诸道勤王兵的种师道守密，也不向卫戍首都的最高长官亲征行营使李纲透露半点风声。高宗常以亲笔手诏，指挥前线战事。岳飞在对金胜利，宋故都收复在即时，高宗即以十二道金字牌传递手诏，命岳飞班师回朝。宋孝宗亦在不明战势的情况下命吴玠撤兵。……

世事本极复杂，战争之变数更是瞬息万千，远非人算可测。皇帝臆度于后方，将帅背书于前线，只会“坐待败衄”——若不致败亦为侥幸。比如神宗时灵州、永乐的大败，钦宗时姚平仲不克而奔而几致宋早亡一年，高宗时对金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宋孝宗时葬送川陕精锐等等，可以说只是宋代“将从中御”所产生恶果中的几例。

“将从中御”不仅违背战理，也违背常识。所以早就受到有识者的批评。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正月，知制诰田锡奏疏，说：“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因此主张“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受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⁵⁰同月，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上

⁴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第3226-3227页。

⁴⁵ 《宋会要辑稿》兵十四之十三，第6999页。

⁴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第499页。

⁴⁷ 《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第9469页。

⁴⁸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第3261页。

⁴⁹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三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引《中兴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⁵⁰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九《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3页。

“御戎十事状”，第一条便是“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⁵¹户部郎中张洎也在同月上“议边状”，以为“将从中御，士不用命”，而“将不中御，众知向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声，制单于之族类者，未之有也。”⁵²以后“将从中御”的危害日见，批评也随之严厉，上引哲宗时吕陶上疏，之后又说：

一切责以小廉细谨，有毫毛之失，而使文吏议其罪。刀笔挫于前，网罗施于后，则倜傥不羁之士，逾义反常以立奇效，岂可得乎？古者捐兵与人，而军中之事听其处决，与夺之权不从中御，而求其成功，盖虽天子之诏有所不闻者矣。今乃不然，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时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⁵³

以后虽有“将兵法”等更革，但对武将的猜忌、防范、贬抑是宋廷一以贯之的总方针。宋代也有名将，也打过不少胜仗，但以强于周边民族的综合国力，多于敌手的庞大军队（仁宗时一百二十余万），却在总体上败多胜少，并终不免两次灭国，大至抑武风气，小至军将不能专其兵，可以说都有不能推委的责任。

宋王朝在中国帝制时代得以与汉唐明清比肩而自具特点：一面是疆土蹙仄，武功不振，国势委顿；一面则是享国之永仅略逊于两汉，百业甚昌盛而文物极灿烂……凡此之肇端皆可溯之于宋初集权于帝王等诸措置。

⁵¹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第 4168 页。

⁵²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第 256 页。

⁵³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一《论任将五弊疏》，第 2914 页。